





子藏工程

-----  
诸子研究丛书  
-----

# 《庄子》“三言”研究

张洪兴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三言”研究 / 张洪兴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7 (诸子研究丛书)

ISBN 978-7-5077-3825-4

I. ①庄… II. ①张… III. ①道家 ②庄子—研究 ③中国  
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先秦时代 IV. ①B223.55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8258号

责任编辑: 战葆红

封面设计: 徐道会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880×1230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 学术顾问

(依姓氏笔划为序)

李学勤 陈鼓应 陆永品  
饶宗颐 卿希泰 傅璇琮

# 总序

春秋战国时期，王官失守，学术下倾，师徒授受蔚成风气，个人著述随之云涌而出。相较于《诗》、《书》、《礼》、《乐》、《易》诸经，私人著述思想自由，内容丰富，体式多样。老聃清静无为而作《道德》，庄周幻梦逍遥而作《庄子》，墨翟兼爱、尚同而作《墨子》，孟轲称美性善而作《孟子》，荀卿看透性恶而作《荀子》，邹衍广猎怪谈而作《邹子》，韩非痴迷法治而作《韩子》。此皆当时著述之英华，学海之太液，载万世而流芳。西汉刘向、刘歆父子董理群书而为《别录》、《七略》，单列“诸子”一类；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效仿刘氏，揽括诸子群英，归为九流十家。至是，子学有名，诸家定称。刘勰《文心雕龙·诸子》曰：“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纪昀《四库总目提要·子部总叙》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子书立说见志，实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源头活水。

然两千五百余年来，诸子之学或盛或衰，各个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战国之际诸子活力劲健，生机勃勃，《庄子·天下》列百家之学，《荀子·非十二子》论十二家之失。两文虽语含刺讥，亦足以窥见春秋战国子学花烂映发、自由挥洒之盛貌。吕氏不韦，招抚宾客，结连辩士，揉合诸说，混成一统，故“循其理，平其私”（《吕氏春秋·序意》），实暗启子学衰败之势。秦皇暴政，黜文任法；汉武尊儒，排斥众议。此间虽有淮南作《鸿烈》，欲“统天下，理万物”（《淮

南子·要略》), 备帝王之道, 然争鸣之风已逝, 子学气韵式微。汉元、成以降, 扬雄《法言》、《太玄》, 王充《论衡》, 勇抒独见, 略溢芬芳。更至东汉, 经学失宠, 诸子容光再闪。而王符《潜夫》, 荀悦《申鉴》, 虽踵武前修, 亦时有创见。

魏晋乱世, 士人惮祸, 慕玄风而尚清谈, 以期全生保真。何晏、王弼、郭象诠释《老》、《庄》, 新意迭起; 葛洪著《抱朴子》内外篇, 屡多创获。然斯风独盛, 诸家皆成附庸矣。而自南北悬隔, 文辞鼓荡, 吟赏之心渐炽, 百家之气日衰。惟梁元帝《金楼子》、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无名氏《刘子》, 隋王通《文中子》, 稍拾余芬, 聊慰人心。

李唐开科举而振世象, 奉佛老而推贝典丹书, 韩、柳又述儒家之道统。士人桎梏, 难觅振聋发聩之音, 诸子之学欲有所推深, 不亦难乎! 宋哲宗元祐中, 吕公著上书请禁: “主司不得出题老庄书, 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 明神宗万历间, 李廷机以子书盛行, 不利孔孟之道, 上疏请求禁止。二子之行, 实以政治强压, 而子学积衰, 难挽濒弱之势。然自明中叶以后, 王阳明、杨慎、朱得之、罗汝芳、焦竑、杨起元诸人, 重以老庄佛道推盛心学, 子学亦随之渐张。明末傅山倡导“经子不分”, 曰“有子而后有作经者也”(《杂记三》), 且身体力行, 评注《老》、《庄》、《墨》、《荀》、《淮南》等, 开近代诸子研究之先声。

有清一代, 文字惹祸, 屡见不鲜。较之前朝, 士人更不敢放言高论, 遂扎堆故纸, 提倡朴学, 集中对周秦汉魏残缺子书加以考订辑校, 补苴修葺。其保存子书, 复兴子学之功, 可谓至高至伟。子学至此别开生面, 遂有复兴之势。及入近世, 政体更制, 禁网松弛, 加之西学冲击, 学者奋智, 瞩目诸子之书, 子学于是彬彬复盛。钱穆、刘文典、冯友兰、于省吾、严灵峰、王叔岷、陈奇猷诸君, 皆是子书考究与子学推深之能手, 其他学者的文章著作亦不可胜数, 且有以兼爱附平等, 以孔学效耶教, 以《淮南》列电力, 子学已与西学渐趋融合。

今恭逢国家富强，文运昭回，为子书整理与子学繁荣复兴提供了极佳机遇。且地下文献沉藏千年而陆续出土，其中多有重要子书，为学者弘扬子学贡献了新资料，亦提出了新问题，创造了新空间。子学之复兴，其在今日乎？

子学之复兴，当以文献搜集整理为先。《四库全书》子部收书 930 余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共收书 1250 余种，《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收书 1640 余种。虽称浩博，实为庞杂。譬如《四库全书》子部，“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四库总目提要·子部总叙》），此乃“经史子集”之子，为图书分类之学，非“诸子百家”之子，已失立说见志之意。且一子只收一种或数种，名家著述、珍希善本、手稿札记，所遗尚多，难副“全书”之名，实为憾事。有鉴于此，为响应国家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倡议，充分发挥传统子学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决定由先秦诸子研究中心领衔，整合各方资源，启动《子藏》超大型子学图书编纂工程。

《子藏》编纂将分两步展开：第一步，搜集自周秦至民国末期所有海内外存世和出土的诸子学之著作，择取最佳版本予以影印；第二步，为每一种子学著作撰写提要。预计完成后的《子藏》，可涵盖《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管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 50 余个系列，约 5000 种著述。如今，《子藏》工程已正式启动，将陆续影印发行。吾人相信，《子藏》必将成为一座宏大的传世经典文库，为海内外学者的子学研究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从而进一步传播和阐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

子学之复兴，不仅仅在于文献资料的建设，更包括子学研究的深入拓展。作为有一定影响的诸子学研究机构，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

研究中心以全面复兴子学为己任，于2007年创办了国内外第一份专业的大型诸子研究刊物——《诸子学刊》，现已连续出版五辑，在中外学界颇有影响。现又决定有计划地出版《诸子研究丛书》，以此作为《子藏》工程之一部分，提升《子藏》的学术品位，使之成为资料库建设和学术理论研究相结合的精品工程。

该丛书海纳百川，包容并蓄，凡与子学有关之论著均在欢迎、吸纳之列。或总论子学之概要，或分论一家之特点，或专论一书，钩玄提要；或独论一题，探隐发微。凡斯种种，论内容；或学派，或专书，或专题，或作家，不拘一格；论方法；或考据，或义理，或阐释，或中或西，百花齐放。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有创造，有突破，自成一言之言者，均可入选。

《子藏》之编纂，为子学研究提供完备丰富的资料库；《诸子学刊》之编辑，为子学研究搭建了交流平台，提供了前沿信息；而今《诸子研究丛书》正式启动，出版有关子学研究之专门著作，又必将推动子学研究朝纵深方向发展。“三驾马车”，或资料，或论文，或专著，齐头并进，已然构成了子学研究的完整系统。

当仁不让，圣人之言；舍我其谁，亚圣之论。值此昌明之世，学术转型之际，我辈同仁当竭尽心智，戮力古学，留意百家，复兴子学，章华夏文明之本，延绵中华数千年优秀文化之传统！

古语云：“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趋。”（《汉书·吴王濞传》）得天下好子学之人，共襄复兴之盛事，岂不快哉！如此，子学全盛之日，可以预卜矣！

方勇

2011年8月18日



# 学《庄子》杂记

(代序)

我学庄多年，总觉难得其要领，故常常冥想，但又总是缠来绕去，混沌不可清晰，甚为难也。然又需拉杂错简，出此小书，实大违庄子“道不可言”之妙谛；又本应请尊者作序，循《庄子》重言之旨，然我又愚钝，无甚创见，实不忍心将《庄子》“寓言”之意加于尊者之身，庄子其罪我乎？

今拉杂往昔之杂想，姑为自序。

## 儒与道的互补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富有激情的、富有理想的时代。当时，西周以来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的礼乐崩坏，诸侯争霸，战乱频频，民众陷入苦难之中。社会如何发展？政权如何巩固？民众如何安乐？一个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士阶层迅速崛起，他们奔走游说，弘言大论，“人人自以为道德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于是就有了儒、墨、道、法等所谓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激情与理想是哪里来的呢？我以为，他们的激情与理想来源于他们心中那份执著的信仰。像孔子，曾任鲁国大司寇并曾摄相事，与鲁国当权者有矛盾后，以五十余岁的年龄毅然

然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十余年间四处碰壁，常身陷险境，然纵如丧家之犬，也矢志不渝。按一般人的思维，五十多岁的年龄，纵不被重用，靠着以前的“待遇”与累积，享受富贵荣华毫无问题，颐养天年毫无问题，但他竟毅然全都放弃——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孔子，任何人无可替代，单从其人格魅力而言，崇高与伟岸之类的誉词在孔子面前都显得苍白与渺小。那是一个人类心智健康的、人类生态良性的令人怀念的时代。

除儒、道外，其他诸家在西汉以后式微，大都丧失了影响力，儒、道思想支撑起了中国古代思想的框架。我这里只谈儒道互补的问题。儒道互补的架构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知道，西周建立后，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礼乐文明的基础。礼乐文明的基本点有二：一是秩序，一是教化。社会需要秩序，有秩序才有和谐，人人各安其分；社会也同样需要教化，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需要修养身心，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社会的规范。教化是为了秩序，秩序又维护着教化，二者相辅相成，这是维护一个族群正常生态的基本要件。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形式上，所谓的官威民德都是靠着形式的要求表现出来的，形式的意义常常大于其本身的内容实质。当人们强调形式时，往往被讥为形式主义，笔者想说的是，当内容没有形式要求时，或者说当内容没有形式“包装”时，往往会不名一文。而教化的内容更为丰富，它的指向更多体现在对传统的学习与继承上，并不单纯地针对平民百姓。其实，教化有什么不好？一个族群之所以成为一个族群，本身就需要维系一种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特征，正如生物圈努力维持着生物的多样性一样，人类不也需要一种多样性的特征、多样性的存在吗？有些人在谈论教化时，总是冠以类似“愚民”的字样，民以何愚哉？愚民者自愚。民何以愚哉？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不都在接受教化吗？只不过是内容、

形式不同而已。

儒家学说或者说儒家文化正是以秩序与教化为基点，以仁为基础，举起礼乐的旗帜，试图改良社会。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伦理纲常，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窃以为，孔、孟所标举的上述原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容与法则，并没有什么不好，只不过是时代不同，内容有异罢了。人首先是一种有情感的、群居的、讲究礼义廉耻的动物。或许，有人批评中国人擅于内斗，但在一个族群内，内斗也是秩序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人类如果要避免被金钱、物欲异化的命运，还是应该努力回归人本身。在儒家文化的格局中，君有君的位置与本分，臣有臣的位置与本分，父有父的位置与本分，子有子的位置与本分，权贵者与卑微者各有自处之道，成就着自己所谓的事业与功名，并以此分享着社会的资源，获得社会的尊重，形成族群的归属感。儒家伦理所产生的族群归属感，实在是儒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大贡献，中国古代社会虽经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虽经蒙古、满清长达数百年的统治，而最终没有分裂，儒家文化功不可没。

但问题是，人心是复杂的，人的情感也是复杂的，不管人如何崇高伟大，如何光明磊落，他总有失意、困顿的时候，人心何以自处呢？况且，儒家学说总显得一本正经，总好像是板着面孔做人，而人性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正如阳与阴、白天与黑夜、光明与阴暗并存此消彼长一样，人也需要轻松、解脱，甚至也需要毫无羁绊地消遣生命，尤其是面对困难、陷入困境，甚至是毫无出路的时候，人心需要一个支点，在最低层次上让他能够活下去——总不至于让他自杀或者胡作非为吧？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宗教观念并不彰显，人们难以从宗教中寻找归依，因此，亟需有一种思想、一种学说来安抚人心、慰藉

情感。道家学说尤其是庄子学说便承担起了这一重责。既然儒家在重构社会的价值体系，庄子就以此为参照系，首先解构儒家所建立的价值体系。在庄子看来，“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思想虽以虚无为本，但其落脚点却是自然之人性与人心。庄子的思想虽似恍惚迷离，让人难以把握，但就其体系而言，则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庄子批判达官显贵，批判世态与人情，批判儒家的价值体系。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既然社会上的达官显贵、当权者出了问题，既然世态人情出了问题，既然社会的价值取向出了问题，既然阴暗成了一种人们见怪不怪的常态，或许社会本该就是这么个样子，人生来就是受苦的，那些所谓的富贵与功名也不过是过眼云烟，人们何不跳脱出去，回归内心，去聆听天籁之音？二是修养心性，在高唱齐物论的基础上，庄子发明了心斋、坐忘、撝宁等修炼方法，以修养心性；并且，庄子通过对庖丁等手工业者精湛技艺的艺术描述，努力寻求人们的行为与道的契合点。三是心灵境界，通过心的修炼，庄子试图达到自喻适志、以天合天、逍遥天放等几种心灵境界。自喻适志即“庄周化蝶”的境界，物我融为一体；以天合天，即神志相凝，合于自然之途；逍遥天放即在“无何有之乡”达到精神愉悦之至。这样，庄子就构建起了自己的心学体系，他的某些思想就具有了宗教思想的特征。

正因为庄子试图把人们从沉重的人情世态中解放出来，即便是人们仍然在儒家的伦理中以功名利禄为着力点，他们也需要一些庄子思想为自己解脱提供支撑，所以，庄子的心学体系（心灵境界）就有了广阔的市场。从这一角度而言，庄子学说具有普世的价值，

虽然《庄子》学说在一定时期内被人讥为阿Q精神胜利法。其实，精神胜利法在特殊境遇下未尝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处于艰难困苦中的平民百姓，他总要给自己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总要把心中的郁结排解开，庄子之道的扩张性以及体道过程所产生的逍遥天放的境界能给人以解脱。况且，即便是有权有势者、大富大贵者，也会有不顺心、不如意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精神问题，庄子自事其心、游方之外的智慧，给人以超脱与平和。所以，穷人需要《庄子》，富人也需要《庄子》；低贱者需要《庄子》，高贵者也需要《庄子》；被统治者需要《庄子》，统治者也需要《庄子》。苏轼所谓庄子“盖助孔子者”在儒道互补的格局中显得尤为恰切。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向来就在进与退、攻与守、高与低、立与破之间挣扎，并总是在努力寻求一个平衡点。儒家、道家文化就如同太极图中的阴阳鱼，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又相互转化，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在儒术独尊之后道家思想仍能够绵延不衰的原因所在。

## 生与死的问题

自然界新陈代谢是天然之定理，人从出生之始，便面临着死亡的问题。如何生、如何死，谁都绕不开去。庄子的学说，在人生的轨迹上，既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在《庄子》书中，生与死、起点与终点纠结着，矛盾着，痛苦着，甚或快乐着。总体而言，庄子的学说是为解决生的问题的，他的逍遥与齐物，他的养生与德充，他的心斋与坐忘，他的撻宁与浑沌，无不以生为基点。庄子要摆脱世态人情的羈累，实现人生的境界。

但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在苦难与危险面前，个人无法选择、

无法改变、无能为力时，庄子往往坚持的是以生为大的一种主张。

在《秋水》篇有“庄子钓于濮水”的寓言，庄子以神龟为喻，毅然拒绝楚王的聘请，表示自己宁“生而曳尾于涂中”。

在《山木》篇有“庄子行于山中”的寓言，大木因其不材得终天年，大雁却因其不能鸣而被杀，因此庄子表示“罔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在《山木》篇中还有“鸪鹑之智”的寓言，庄子借孔子之口，以鸪鹑为喻，强调在人世间要谨小慎微才能够保全自己。

庄子的以生为大的主张，是和庄子之道的扩张性联系在一起的。庄子之道无处不在，在道面前，人和人是平等的，每个人也都是自由的。所以，每个人都有活着的理由与价值。说到这个问题时，我总忍不住说两句阿Q，纵便是我上文刚提到过他，在下文中还要议论他。

我们谈论阿Q时，常常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评价他。阿Q是社会底层的一个弱者，他的命运非常不幸，但问题是如何让他去争呢？鲁迅也没有让他去争，带着怜悯之心把他判了死刑。其实，争与不争是个非常沉重的甚或是重大的问题。人类社会即如动物界的多样性一样，我们并不都如老虎、狮子一般，我们有些人、有些时候也如小绵羊、小白兔一样弱小而无助；我们并不都是强者，弱小者在“丛林法则”中要学会自处之道。庄子在现实社会中所提倡的隐、忍之道，其实是符合人性本身的，也是使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每个人的心力、才智、运气本来就不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何必要强求他们一样呢？抑制豪强、保护弱者，这是每一个执政者的责任。

说句题外的话，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的是所谓“造反有理”的学术，所以我们在评价人物、分析作品时，总是在寻求他们的批判性、叛逆性，并给予他们很高的评价，这或许是革命时期需要的一种理论导向。当社会进入和平时期，进入建设时期，我们研究的该是如何使

社会稳定、和谐的理论及措施，连刘邦君臣都知道“打天下”与“坐天下”的不同，我们何必要过分强调那些东西呢？

需要指出的是，庄子对生的态度又似乎是矛盾的，他在强调贵生的同时，又在批判着人世，哀叹着人生。在《齐物论》中，他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耶！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生注定了是一种“大哀”；在《至乐》篇中有“髑髅乐死”的寓言，庄子借髑髅之口，宣扬“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死之乐反衬的更是生之“大哀”；孔子在《庄子》书中常以落魄者的形象出现，惶惶若丧家之犬，体现的是现实的不平与艰难；《大宗师》篇“子舆与子桑友”的寓言中，子桑所说的“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哀叹之声可谓感天动地。

庄子将人需要忍受的各种苦难归之为“命”，并把“命”和“德”结合起来。《人间世》借孔子之口说：“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这样，“命”和“德”就成为一个整体。把“命”和“德”结合起来，很多现实的人生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对庄子来说或许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庄子在强调德全的时候，虽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天地》），但有时还是将“命”（形）给舍弃了。在《让王》篇中，北人无择自投清泠之渊，卞随自投桐水而死，警光负石而自沉于庐水，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山。这些人为了保持自己

独特的人格与品行，抛弃世俗之乐与世俗之“形”，毅然自绝。所以，庄子的学说体系中有不少矛盾，前后不能自圆其说，这或许就是庄子学说，尤其是《庄子》寓言的魅力之所在。这些含混的，可不可、然不然式的话，正是《庄子》文学、《庄子》学说匠心之所在。

庄子虽是在努力探讨如何生的问题，同时他又试图解决如何死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一个人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一个人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时，死亡的恐惧大概难以忍受。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得知自己得了绝症之后，生命往往会很快终结，“被吓死”常常占着很大的比重。摆脱或者是消解死亡的恐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方面宗教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我们的宗教观念却不发达，纵使有些人相信鬼神的存在，也只是一宁信其有的态度，如何消除死亡的恐怖呢？在这方面，我们先看看庄子自己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说是对死亡的体验。《列御寇》篇中有“庄子将死”寓言：“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一个人在将死之前，尚还有如此的言语，是何等的超脱！

在前面我们说过，一个人活的时候需要一个支点，死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一个支点的，庄子是如何寻找这个支点的呢？笔者以为，庄子的这个支点包括生死为一、生不如死、超越死亡三个方面的内容。

生死为一。庄子对死亡的认识，大概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看《至乐》篇“庄子妻死”的寓言：庄子妻子去世后，惠子去吊唁，庄子正鼓盆而歌，当惠子指责庄子的无情时，庄子说：“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



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春夏秋冬四时行也。”当庄子的妻子刚去世时，庄子说自己“何能无慨”，痛苦之情溢于言表，庄子本就是至情至性的人。但庄子是个智者，他思考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并将之归为一种循环论，将之归为一个过程，生而死，死而生，生死相依，就如春夏秋冬四时交替一样，自然而然。在《知北游》篇中，庄子借黄帝之口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表达的是同一层意思。或许，生命本就是一个过程，气聚则生，气散则死；而生老病死，则如新陈代谢，与时推演而已。

生不如死。在《至乐》篇中有“髑髅乐死”的寓言：庄子到楚国去，见到一个空髑髅，因而探寻其死亡的原因。夜里梦见髑髅，向庄子陈说死之乐趣。在髑髅看来，“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欲恢复其形体、心智，髑髅则深瞑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髑髅所说的死之乐趣，正反衬着生的繁文缛节、生的艰难困苦、生的茫然无助。既然生是如此艰难，死又有何放不下的呢？就这一点儿来讲，大概生前享受越多的人，对生越放不下，对死亡的恐怖就越甚；而贫苦之人，生前受过磨难的人，大概对生的留恋程度要小得多，死前或许会说句“早死早脱生”，两眼一闭，便撒手归西。这则“髑髅乐死”的寓言，庄子借梦境、借死人之枯骨说理，本身就在亦真亦假、亦真亦幻之间，因为死后的状况谁也不知道，也无从知道。庄子所说的这种“生不如死”的状态，借批判人情世态，更多的是给人们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超越死亡。庄子包括道家，又试图以人的不死来解决人的死亡问题，如《逍遥游》篇有一位藐姑射神人，能“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大宗师》篇中有“登